

王尔德著 余光中译

理想丈夫与不可儿戏

——王尔德的两出喜剧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理想丈夫与不可儿戏

——王尔德的两出喜剧

王尔德 著 余光中 译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理想丈夫与不可儿戏:王尔德的两出喜剧/(英)王尔德著;余光中译. 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8.3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外国文化书系)
ISBN 7-5382-5071-9

I. 理… II. ①王… ②余… III. 喜剧-剧本-英国-近代 IV. I561.309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8)第02903号

学术策划 王 士 林 夕 柳 叶
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三越勇
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

总 发 行人 俞晓群
责 任 编 辑 柳青松
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
封 面 设 计 陶雪华
责 任 校 对 马 慧
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(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)
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
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
版 次 199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开 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6.5
字 数 148千字 插页 1
印 数 1—10,000册
定 价 7.80元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第二辑弁言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生也逢辰，问世之时，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大步，书业也连带繁荣兴盛，因此初印销数不俗，令人高兴。但也可说生不逢辰：因为某些媚俗的销售方式时下日益成为出版行业的时髦操作手段，走进书市，“爆”、“炒”之声不停，大违箴议这一《文库》时的行销氛围。在这情况下，像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这类图书，究竟应该如何进入市场，迎迓读者，颇劳心神。在这时刻，有明眼人忽然援引马克思名言：“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，而将永远存在……”，以为书业箴诫。我们读之大喜，铭诵再三，并据以拈出十二大字：“不求显赫一时，但愿传诸久远”，成为我们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。也因此使我们坚定信心，决心朝这方向不断前进——即使可能出现某种挫折。

既然“传诸久远”成为我们的基本方针，自然需要我们在选题、编纂、排校等等运作上更费心力。第一辑出书后，反应大抵可以，但是批评意见仍然不少。当年《万有文库》定价低廉，我们可说是大体继承下来了；据说当时的某些图书校讎未精，为时人诟病，我们力求避免，但是错谬之处还是可能出现；至于选题，入选之书虽然大多系经名家指点、高手操作，但就总体看，有些不免失诸凌乱（尤以外国文化书系为甚）。凡此种种，我们都认真听取批评，并在调整、改进之中。选题体系严谨，是我们追求的高目标，但就译作而言，因为版权关系，不免为难。就第二辑看，此病仍难消除。不过，当今的丛书，似乎追求系统、完整过多，有时不免因此影响质量。我们想学习巴老等前辈当年创办

《文化生活译丛》的办法，以质为尚，体例为次。自然不可“拉在篮里就是菜”，但是凡是可食的优质营养品，略加搭配，不论次第，纳入“篮”中，而不计较是否可以由此烧出一台完整的“满汉全席”。此种意义上的“菜篮子工程”，读者其许我乎？！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之能问世，得力于各位前辈学人、专家学者的指点。我们曾将有关各位大名，弃诸每册卷首，作为永久纪念。本辑开始，不再印出各位大名，而只是藏诸内心。把书编好、出好，为读者服务得更好，即是我们对各位贤硕的最好纪念和感谢！

一九九八年二月

百年的掌声

——王尔德喜剧《理想丈夫》译后

一

整整一百年前，王尔德有两出喜剧相继在伦敦首演，同样轰动文坛，其中的妙语警句，无中生有，匪夷所思，反常偏偏合道，无理偏偏有趣，令人入耳难忘，更是众口竞传。那年一月《理想丈夫》(An Ideal Husband)上演成功，威尔斯与萧伯纳都为文称美。二月间《不可儿戏》跟进，更是轰动。一位剧作家同时有两出戏叫座叫好，真可谓占尽风光了。王尔德不免得意忘形，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有多保守，对于自己的同性恋情非但不知收敛，反而当众宣扬。他不服男友德格拉斯的父亲昆司布瑞侯爵指他“好男色”，不听别人劝阻，径向法院控告侯爵，结果官司败诉，他反成被告，法院判他同性恋有罪，入狱苦役两年。刑满出狱，王尔德不见容于英国的“上流社会”，也就是他在四出喜剧中一再讽刺过的 the Society，乃自放于法国，三年后死于巴黎。

王尔德的悲剧是双重的反讽：其一是失败的深谷紧接着胜利的高潮，把“否极泰来”颠倒成“泰极否来”。另一是唯美才子王尔德，身为英国传统“善构剧”(the well-made play)高手，明知秘密乃戏剧之灵魂，而剧情在保密与泄密之间柳暗花明，迂回进展，才能够维持紧张而达于高潮，明知如此，却不肯在一百年前的那个社会守住自己的重大秘密，反而自暴隐私，身陷囹圄，终于流亡海外，真的成了自己剧中的“沧桑男子”(man with a past)。

在《不可儿戏》里，亚吉能和好友杰克是一对难兄难弟。亚吉能为了逃避欧姨妈，创造了一个长期病人叫梁勉仁（两面人），便于随时下乡；杰克为了追求关多琳，创造了一个弟弟叫任真（认真），便于随时进城。两人都有自己的秘密需要瞒人，但是两人其实是多年失散的亲兄弟，这天大的秘密，却要等到剧终的高潮才霍然揭晓。

《温夫人的扇子》里，欧琳太太原来是温夫人的母亲，二十年前抛弃女儿，随情人私奔，不久却被情人抛弃，流落江湖。二十年后她听闻女儿嫁了贵夫，便利用自己的秘密向温大人勒索到一笔财宝，并借温大人的牵引，得以重回上流社会。这一切隐情，温夫人全然不知，反而疑惑丈夫有了外遇。温大人夹在妻子和岳母之间，既要瞒住妻子，又要满足岳母，两难的困境使剧情倍加紧张。温夫人在羞愤之余，私奔爱慕她的达林顿大人，幸有欧琳太太，她心目中的“坏女人”，及时赶去劝阻。但是这么一来，温夫人自己也有了一个秘密不可告人，及而要靠那“坏女人”为她掩饰。这一大一小的两个秘密，形成了剧情起伏的关键，几度被推到败露的悬崖，带来高潮。

二

《理想丈夫》也有一个重大的秘密，不得泄漏。外交部次长齐尔敦爵士年轻时担任赖德利勋爵的秘书，得悉英国政府拟购苏伊士运河的股份，将内阁机密泄于安海男爵，获利致富，因而宦海一帆风顺。当年他写给安海男爵的那封密函，落入了男爵情妇薛美丽太太的手里。薛太太乃以此信威胁齐爵士，逼他在下议院支持她重资投机的阿根廷运河计划，他若不从，就将此信公开。

齐爵士多年前的隐私忽然面临败露，顿感双重的威胁。其一是政治生命即将断送，其二是一旦揭发，爱妻恐将不再爱他。齐夫人是一位有道德洁癖的清教徒，一向崇拜丈夫，认为他高贵无瑕，一旦发现他败德的真相，婚姻必然不保。前有强敌，后有严妻，素来受人敬畏的齐爵士十分恐慌，顿成弱者，一位被多年隐私回头反噬的“沧桑男子”。

但在另一方面，齐夫人在情急之余派人送了一封短笺给高凌大人，只说：“我需要你。我信赖你。我要来找你。”不巧这封信也落到了薛太太手里，这次成为对齐夫人贞洁的威胁。

和齐爵士一样，薛太太也有她不堪追究的过去，包括偷窃和诱婚，十足一位“沧桑女子”(woman with a past)。原来她和高大人订过婚，却又被撞见与一位老贵族调情，解约的条件反而使她得益。这时她在胁迫齐爵士后拜访高大人，欲续旧情，并且表示愿意放弃齐爵士的旧信，换取高大人娶她为妻。高凌拒绝了，反控她当年偷了他送给妹妹当婚礼的钻石胸针。薛太太只得交出齐爵士的旧信，却乘机窃走了齐夫人的新函。

社会栋梁的齐爵士夹在对峙的两个女强人中间，没有出路，成了弱者。反之，玩世不恭的高大人，伦敦第一闲人，在紧要关头却出手相救，解除了他的危机。在高大人的面前，两位女强人却成了弱者：一位被他制服，一位被他说服。对比着名高权重的齐爵士困兽盲斗，一事无成的高大人更显得谈笑风生，指顾间，强虏已灰飞烟灭。高大人不是危机的当事人，却是本剧的真正主角。

王尔德剧中的人物，大致可分为对照的两类：其间不是道学的正邪之别，而是美学的雅俗之分。正人君子、淑女贤媛一类，在道德上当然属于正方，但在风格上却未必是雅人。反之，浪子名士、浪女刁娃一类，在道德上不属于正派，但在风格上却未必是俗客。《温夫人的扇子》里的温氏夫妇、《理想丈夫》里的齐氏伉俪，皆属前一类。《温》剧里的达林顿、《理》剧里的高凌，属于后一类。《不可儿戏》完全超越了道德纠纷，原则上一切角色都不正派，只有配角劳小姐是个小小例外；至于杰克和亚吉能一对浪子，加上关多琳和西西丽一对刁妮，当然都属于后一类。每逢正主在场，多半言语无味；一到反客开口，妙语警句就如天女散花，飘逸不滞，绝无冷场。王尔德的名言大半是由他们说出来的。但是正派角色却也不尽无用，因为反派的放浪形骸需要他们提供背景，设定坐标，来作陪衬。

高凌是这一切花花公子里面最飘然不群的一位。论者几乎一致认为，他就是王尔德的化身：他的风趣机智，倜傥自赏、懒散不振，却又见解通达，都来自赋他生命的王尔德。单看《理想丈夫》里，他在第一幕出场，介绍之不足，更在第三幕出场时再加描写，便知王尔德对他如何刻意经营。第一幕说他“一张有教养而无表情的脸。很聪明，但不愿被人发现。十全十美的纨绔子弟，如果有人认为他浪漫风流，他却会不悦。他游戏人生……喜欢被人误会，以取得有利地位”。第三幕又说“看得出他熟习现代生活，其实是在创造现代生活，并善加掌握。他是思想史上第一位穿得体面的哲学家”。

高凌衣着光鲜，谈吐高雅，开口辄有惊世骇俗的怪论，味之则微言每有大义，反话不妨正解，歪理偏可妙悟。不过，他虽然出口成章，妙答不绝，说来却是行云流水，似乎漫不经心，正所谓“苦心经营的淡然”（carefully studied nonchalance）。除了王尔德之外，世上没有几个人会如此对答的：

贾大人 哦，去你的同情。这年头啊这一类事情搞得大过火了。

高大人 我完全同意，父亲。人间如果少一点同情，人间就会少一点烦恼。

贾大人（走向吸烟室）你还是正话反说嘛，少爷。我最恨正话反说了。

高大人 我也是呀，父亲。这年头呀无论你遇见谁，都是正反难分，烦死人了。这一来，整个社会就大一目了然了。

贾大人（回过身来，浓眉下的双目注视着儿子）少爷，你讲的话，自己真的是句句都懂吗？

高大人（略现迟疑）是啊，父亲，只要我用心去听。

跟王尔德一样，高凌也是一个自恋狂，对自己的完美无缺惊艳不已。第二幕中，齐爵士担心隐私会败露，又希望能抓到薛太太的短处，请教高凌对付之策，高凌竟说：“我一点主意也没有。可是每个人都有弱点的。人人都有他的漏洞。（踱到壁炉前面，对镜自照。）家父就对我说，连我也有缺点的。也许我真有。我不知道。”高凌此语是对镜而言

的，活生生一幅水仙花顾影自顾，但在自怜之余却又有自嘲，因为自负如此，简直近于天真无邪。百年前伦敦的观众，对此当然齐声哄堂。王尔德式的对话真的是匪夷所思，连他的同行兼同乡萧伯纳也赞不绝口：

王尔德先生在“干草市场”剧院上演的新戏，是一个危险的话题，因为他有本事使剧评家显得平庸。剧评家们一面火大，一面却被他的连珠警句逗得大笑，正如一个孩子刚要作势发出怒吼与痛呼，竟然被人哄开了心。剧评家们抗议，说花招太过露骨，而那些警句呢，谁要是心情够好，不在乎那么胡说八道，都可以炮制个几十条的。就我所知，伦敦之大就我一个人没法随时坐下来写一本王尔德式的戏剧……从某一点说来，我认为王尔德先生是当代唯一的十足剧作家。他戏弄一切：机智、哲学、戏剧、演员、观众，甚至整个剧场。

三

剧中另一要角当然是薛美丽太太。她也是一个不拘世俗的反派人物，衣着讲究，交游广阔，手段高明，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女浪子、女名士，和高凌配成一对。可是她偷窃成习，以色取财，甚至不惜勒索、诬陷，坏事做得心安理得，十足是一个恶人(villain)。终于和高陵匹配成双的，却是齐尔敦爵士的妹妹齐玫宝。

王尔德介绍齐玫宝出场时的描写，全是正面的好话，对她的偏爱可见。“她具有一朵花全部的芬芳与自如。她的发间有一波波的阳光，她的小嘴双唇微启，若有所待，像孩子的嘴。迷人的是她青春的骄横，惊人的是她天真的果敢。”这样的美文简直是在写童话了，但是她的性情在天真可爱之中另有“骄横、果敢”的一面，不与世俗同调，而与高凌共鸣，所以每一出场，也多妙语奇论，倒真有刁妮子、女名士的风格。例如高凌之父贾大人骂儿子生活懒散，齐玫宝就为她的意中人辩护道：“他早上十点钟去海德公园骑马，每星期看三次歌剧，每天至少换五次衣服，到社交季节更是每晚在外头吃饭。您倒说这是懒散度日吗？”

齐玫宝与高凌步调相同、语气一致，可谓高凌的响应、帮腔、配角，所以许多评论家说她是高凌水仙花自恋情结的女神“回音”(Echo)。这

一对独立特行、自有主张的金童玉女，才是《理想丈夫》中理想的双璧，而台面上的当事人齐爵士夫妇，虽历经劫难而破镜重圆，但其美满已有裂缝，尽管剧终齐夫人对丈夫保证纯然的爱情，而且“新的生活正开始”，我们的信心却已打了折扣。

《理想丈夫》将齐爵士热中权威的丈夫气概对照高凌淡待功名的纨绔作风，然而面对危机，却是浪子挽救了绅士。足见浪子也自有其价值；高凌看来柔弱，却比齐尔敦更有原则，也更有办法。到剧终时，齐尔敦不可告人的秘密还是给保住了。除了勒索他的薛太太、谅解他的齐夫人、解救他的高凌之外，世界之大，更无一人知情。整个剧情推到灾祸的崖边，幸而终未失足。

不过《理想丈夫》的剧名却成为讽刺了。究竟谁才是理想丈夫呢？绝非齐尔敦了吧。齐夫人对丈夫的期许曾经订得太高了，对丈夫的奉献也要求得太多了。第一幕开始，大厅上高挂的那巨幅绣帷《爱之胜利》，也显得有些空洞了。剧终时高凌向齐玫宝求婚成功，他的父亲警告儿子不得亏待了好媳妇。

- 贾大人 如果你对待这位小姐不像个理想丈夫，就休想得到我分文遗产。
- 齐玫宝 理想丈夫！我才不稀罕呢。听来像是下辈子的事情。
- 贾大人 你究竟要他做什么呢，好孩子？
- 齐玫宝 他爱做什么都可以。我只想……做……哦！踏踏实实做他的太太。
- 贾大人 说真的，齐夫人，这句话大有道理啊。

看来这一对新人才是佳偶：妻子无求于丈夫，而丈夫无求于世界，婚姻就从这朴素天然的低调开始，大概也不会有太太的幻灭吧。

四

还有几件事我要一提。

王尔德这些善构的喜剧，都各有一件象征所寄的道具，成为剧情囍

目的焦点。在《不可儿戏》里，那是杰克成为弃婴时所寄的手提袋。在《温夫人的扇子》里，当然是那把风情无限的香扇，简直可比中国的《桃花扇》了。在《理想丈夫》里，众目睽睽的焦点是那致命的密函。女贼薛太太紧紧握在手里，不但可以勒索一位贵人，报复一位同学，还可以挽回一位旧情人，真是一物三用，功莫大焉。可惜等了那么多年，它终于被迫交出，立刻灰飞烟灭了。但立刻她的空空妙手又窃来一信，齐夫人致高凌的也是密函，但威力较小，也终来奏效。这两封信横跨四幕，造成了全剧的紧张，但是在实际的剧院里，视觉的效果不可能像扇子那么可挥可点、可落可拾，招数多多。

另一道具是薛太太遗落的胸针，被高凌拾走。那是一枚蛇形的钻石别针，镶了红宝石，原来是高凌送妹妹的结婚礼物，被薛太太偷走的。此物或作胸针，或作臂镯，可以两用；薛太太本非物主，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所以仓卒之间被高凌佩在她的臂上，再扯也不开，终于只好交出那封密函。敏感的评价家不免在这件事上穷究其象征意义，例如德拉莫拉(Richard Dellamora)就在《王尔德，社会清规，与《理想丈夫》》一文中指出，蛇口衔着红宝石，宛如衔着苹果，可作种种两性的联想，而缠臂不解，更有自陷其阱之象征。当晚薛太太来访高府，王尔德说“她的衣裳绿色配银色，有若女蛇妖蕾米亚。她的黑缎披风用不反光的丝线织成玫瑰叶形的边”。德拉莫拉认为，这一段描写可以影射柯立基叙事诗《克莉丝泰波》(Christabel)中的蛇妖。

王尔德介绍剧中人物出场的描写，虽然寥寥数笔，却字斟句酌，生动而传神，不愧《朵连·格瑞之画像》的作者。即使描写高大人的管家费普思，也非常出色：“费普思之出众，在于不动声色。热心分子称他为‘模范管家’。就连司芬克狮也不像这么讳莫如深。他真是有模有样的面具。至于他思想上或情感上的生活，也史无可考。所谓形式至上，此人足为代表。”

五

一百年前的一月三日，《理想丈夫》在伦敦首演之夜，十分轰动。威尔斯亲王也在包厢里观赏，剧终更向作者道贺。王尔德表示戏长四小时，恐须删去数景才行。亲王却说：“拜托你，一个字也删不得。”

四个月后的王尔德，伦敦文坛的骄子宠儿，忽然身败名裂，沦为狱中之苦囚，然后羸愁潦倒，客死他乡。

一百年后，英国心软了。同性恋已经不值得大惊小怪，而王尔德的天才仍然可羨可惊。于是西敏寺的诗人之隅，为纪念一世纪前上演他的名剧，举行了一个盛典，把一幅蓝色与灰色相间的菱形彩窗供献给他。

一九九五年八月二日于西子湾

一跤绊到逻辑外

——谈王尔德的《不可儿戏》

“好心的美国人死后，都去了巴黎”，王尔德在小说里这么说过。在他的剧本里，杰克要解决他虚构的弟弟任真，也非常方便地伪称他因为中风死在巴黎；后来改了主意，又把死因说成重伤风，而非中风。可是最后真正死于巴黎的，却是王尔德自己，死因是脑膜炎，死前隐名埋姓，景况萧条。

纪德追忆他做文艺青年的时候，曾听王尔德大言自剖道：“你想知道我一生的这出大戏吗？那就是，我过日子是凭天才，而写文章只是凭本事。”王尔德当时没有想到，他利用天才自编自导的一生，在最得意的高潮会突然失去控制，不到三个月便身败名裂，幽禁困囿，不到六年便潦倒以终。《不可儿戏》(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)里的狡黠少女西西丽对家庭教师劳小姐说：“我不喜欢小说好下场，看了令我太颓丧了。”劳小姐说：“好人好下场，坏人坏下场，这就是小说的意义。”西西丽说：“就算是吧。不过似乎太不公平了。”在今日的伦敦，王尔德这种人大概已不能算“坏人”了。吾友陈之藩就慨乎言之：“没有一个天才不是同性恋！”这句话本身就有几分王尔德的味道。坏人坏下场，似乎太不公平。反过来说，不能算坏人而竟有坏下场，照王尔德的矛盾语法，是否就应该庆祝，却迟了八十年，来不及问他了。

二

王尔德对纪德说那句大话，是在一八九五年。那时他正四十一岁。也就在那一年，他同时饱尝成名之甘与铁窗之苦。照他的艺术观说来，成败如此鲜明，又如此接近，也可以说是修辞上对比（antithesis）的一大胜利了。

《不可儿戏》在伦敦圣杰姆斯剧场的首演，是选在二月十四日，西方的情人节，一名圣范伦丁日（Saint Valentine's Day）。首演选在这一天，颇合剧情，因为这是有情人终成美眷的热闹喜剧，而剧中人西西丽的暗自心许正是二月十四。那天天气很冷，满街都是雪泥，伦敦的市民拥在街上，看紧裹貂皮大衣的名媛淑女匆匆进入剧院。青年观众则学王尔德，都在襟上佩着铃兰。剧院里面却温暖如春，漾着香水的气息。看得出这出戏今晚会一鸣惊人，可是知道内情的人，在兴奋期待的心情之中又不免暗暗担忧。因为昆司布瑞侯爵，王尔德“腻友”德格拉斯的父亲，也订了座。虽然演出人乔治·亚历山大及时发现而将订座取消，这位愤怒的父亲仍然赶来搅局，手里捧了一扎红萝卜和白萝卜拼成的“不雅花束”（phallicbouquet），准备在剧作家出场时用来打靶。院方不让他进去，并在每一道门口布下警察。好出风头的王尔德这次也破例，躲在后台，始终没有露面。

一夕有惊无险，《不可儿戏》的首演轰动伦敦，从观众到报纸，一片好评。以往对他的剧本毁誉不齐的剧评家，这次也在满意的笑声中一致赞扬。《纽约时报》的评论家费甫（Hamilton Fyfe）说道：“可以说王尔德终于一展绝招，把他的敌人全踩在脚底了……这剧本格局小巧，全无目的，就像一只纸做的气球，可是却滑稽得不同凡响，大家都认定它会无限期地一直演下去。”

这是二月中旬的事。那年一月，王尔德已经因为《理想丈夫》的上演大出风头，连小说家威尔斯也为文称美。等到《不可儿戏》也推出后，王尔德便有两出戏同时在伦敦上演，而且都很叫座。这种风光，有哪位

剧作家不引以自豪？王尔德也真是飘飘然了。可是三个月后，他官司败诉，告人不成，反被人告，法院判他同性恋罪有应得，入狱苦役两年。

三

从谢利丹的《造谣学校》到王尔德和萧伯纳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才出版的喜剧，散文喜剧在英国的文坛沉寂了不止一个世纪。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坛，无论诗、散文、小说，都有骄人的成就，唯独在戏剧一方面欲振乏力。大诗人如华兹华斯、柯立基、拜伦、雪莱、济慈、丁尼生、白朗宁、安诺德、史云朋，或拟希腊古典，或步莎髯后尘，没有一个没写过诗剧。但是说来奇怪，这些“书斋剧”尽管雄词丽句砌成了七宝楼台，但是念起来却感到沉闷，而演起来呢也显得别扭，没有一出能久立于戏码。大概天降文才，除了莎士比亚一流的少数例外，罕见一枝妙笔能兼诗才与剧才之长。王尔德就是一个例子。他才思闪电，妙想奔泉，一片锦心无论付予巧腕或是宣之绣口，莫不天衣无缝，令人惊叹。他雄心勃勃，一身而兼诗人、小说家、戏剧家之名，但是依文学史的定评，他的传后杰作在戏剧和小说，至于他的诗，则除《列丁监狱之歌》外，多半追随浪漫派与前拉菲尔派的余风，只能算是二流。他的小说《朵连格雷的画像》设想之奇可比爱伦坡，不幸只此一部，乃似钱锺书的《围城》，独一无二得可贵又可惜。

余下来的镇舱之宝，就是他的五部戏剧了。^①这五部作品依次是《莎乐美》、《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》、《无足轻重的女人》、《理想丈夫》、《不可儿戏》；其中只有《莎乐美》是悲剧，余皆喜剧。《莎乐美》是用法文写成。后来由作者的那位男友德格拉斯译成英文。在中国，名气最响的一部是《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》，那是因为早在一九二五年，洪深就把

^① 王尔德早期还有两个剧本，《维姆》和《巴杜瓦的伯爵夫人》，都写得很糟，与《不可儿戏》判若两人之作。我这篇文章本可附加几十条注，打扮成“学术论文”。却怕王尔德笑我小题大作，反话正解，就算了。

它改译并导演，而且换了一个中国味的剧名：《少奶奶的扇子》。洪深在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戏剧集的导言里，自述《少奶奶的扇子》演出后，颇得好评，只有田汉去信指摘。但是仅在四年之前（一九二一年），英国另一现代戏剧大师萧伯纳的社会问题剧《华伦夫人之职业》，由汪仲贤译述并促成上演，却一败涂地，“演未及半，已有几个看客在台下纷扰起来，甚至有些要想退票还钱！”究其原因，是萧剧在中国首演，距五四运动只有两年，一切条件均未成熟，加以萧大胡子笔下的人物个个雄辩滔滔，议论冗长，“区区六个人，在台上平平淡淡说四个钟头的话”。而到了《少奶奶的扇子》，话剧运动已稍开展，各方面的条件都有进步，况且王尔德的作品结构单纯，情节紧凑，正是宋春舫所谓的“善构剧”（the well-made play），宜于雅俗共赏。

王尔德和萧伯纳是重振英国剧场，尤其是散文喜剧的一对功臣。我们觉得萧伯纳比较“现代”，不但因为他的戏剧较重社会批评与思想探索，也因为他的寿命长出王尔德一倍有余，多经历了两次大战。其实王尔德虽然拿了唯美运动的铃兰花旗，他的喜剧里也不是毫无社会讽刺，而比起老萧来，也只大两岁而已。最令人注目的，是两人都为爱尔兰人，且都生在都柏林。其实英国的喜剧作家多为爱尔兰人，尤其是都柏林人，即或不生在该城，往往也在该城读书。十八世纪的康格利夫、法克尔、哥德斯密和稍晚的谢利丹，莫不如此。如果不限于喜剧，则王尔德以后的剧作家，还包括辛·欧凯西、叶慈、贝凯特。

爱尔兰人以机敏善言见称，英国的讽刺大家史威夫特生在都柏林，不为无因。批评家傅瑞泽（G. S. Fraser）就说：“大致说来，爱尔兰人对于辞令之为社交艺术颇具本能，所以言谈活泼，俏皮，流畅，又善于修辞；凡此皆为英国人所不及。”一般说来，英国人比较古板，甚或近于鲁钝（stolid），而尤以维多利亚时代的上流社会为然。李耳（Edward Lear）、卡洛尔（Lewis Carroll）、吉尔伯特（W. S. Gilbert）等怪才的谐诗，所以出现在十九世纪的后叶，恐怕也是对当时道学气氛的一个反动。然则由一位爱尔兰的才子去伦敦的风雅场中奇装异服，诡辩怪论，警世